

“新中式”: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的复兴

□ 刘悦笛

近些年来,“新中式”的流行,成为当今社会令人瞩目的现象。从表面上看,这种中国潮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是海外知名品牌的西化流行,而是马面裙、宋锦外套、香云纱衬衫的本土时髦,并还在逐步外销海外。而且,在服饰流行之外,这种热潮早已延伸到家居、饮食、旅行等生活领域,无论是“围炉煮茶”还是“国风摄影”都已成为被追捧的对象。但从深层观之,“新中式”在当代盛行,显现出的是中国“生活美学”的复兴,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并不是单纯为了实用目的,而是有着对美的追求。

何为“新中式”

究竟何为“新中式”呢?所谓“新”,即是适合当代生活;所谓“中”,就是承续中国传统;所谓“式”,则是形成当代模式。“新中式”所代表的正是中国人返本开新的审美生活方式,它不仅是中国生活的复兴,还是中国式美学的复兴。广义的“新中式”,并不囿于着装与家具,而是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本身是立体的、全面的,“新中式”浪潮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本土生活复兴。如今的生活美学家们,就在践行着茶、香、花、琴、书、画、乐、舞、服、妆各种“美之道”,从而获得更为幸福的生活。

“新中式”属于中国人对自己幸福生活的一种追求,而幸福本身就是个美学问题。“新中式”的内核就是一种以今释古的“生活美学”,“生活美学”与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息息相关:美好生活既是“好生活”也是“美生活”。“好生活”是有质量的生活,而“美生活”则是有品质的生活。当“新中式”用“美生活”去提升“好生活”、以生活品质去提升生活质量之时,就是对于美好生活的高级追求。“新中式”就是增加“幸福含量”的本土化的审美生活方式。

“新中式”的走红,也被网友们戏称为“血脉觉醒”。实际上,所谓“血脉觉醒”乃是一种“文化自信”,其背后凸显出来的乃是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当一名青年人,使



清代红色暗花芝麻纱绣人物地景纹鱼鳞裙

用“新中式”、消费“新中式”、分享“新中式”的时候,他内心所荡漾的自豪感与享受度,大概就是对“血脉觉醒”的最佳展现。但仅有“文化自信”还是不够的,自觉之后才会有“文化自信”,自信之后终会有“文化自立”。只有当我们以本土文化的自立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被全球认同的文化复兴。

“新中式”的主要载体就是新青年

“新中式”的主要载体就是新青年,他们所造就的青年文化新潮,呈现出自下而上的青年文化觉醒,新青年的崛起所带来的便是新文化的跃动。笔者曾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新青年新文化》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政治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构成三角结构,但是新世纪后,中国文化发展则呈现为五角星架构:主流文化位居上角,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拉开两翼,而五角星的两角则是日渐式微的精英文化与愈演愈烈的新青年文化,这便为“新中式”的兴起提供了最为稳固的社会支撑。

实际上,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复古都是创新。欧洲文艺复兴表面上是为了复古希腊罗马的“古”,但创作出来的是文艺复兴的“新”,唐宋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所开启

的乃是一代新的文风。“新中式”看似是在复古,其实同时更是创新,它所实现的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转化性创造。“新中式”并不是要回到那个传统中国,传统当随时代,也要与当今的审美与生活相匹配,通过“新中式”的发展,力求以传统文化外在的“形”来复兴其内在的“神”。在创新的过程中,抄袭成风、缺乏新意、东拼西凑的现象必然会出现,但这只是短期现象,通过规范产业的方式就可以“开源节流”——开优质之源,节劣质之流,无需进行过于激越的文化批判。

“新中式”的海外传播要“种文化”

“新中式”的海外传播尚待假以时日,才能获得国际上的普遍认同。可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穿着汉服到了世界各地,从旅游景区到毕业典礼,都可以看到身着汉服的身影。从国内来看,目前中式服装占市场比例的情况是:“新中式”占得半壁江山,汉服紧随其后,旗袍落在后面。

如今,到了“扬帆出海”的时代了,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不是去“送文化”,而是要“种文化”。这一“送”与一“种”,其实有着本质差异,“送文化”只能消费一时,“种文化”却可以生生不息。所以,这一轮的文化出海,就是要去海外播撒“新中式”的种子。在传播之前,还有一份工作亟待完成:那就是选择优质且定型化的“新中式”文化,这就需要设立“新中式”的各种标准。与此同时,如何打造中国自己“新中式”的文化品牌和美学品牌,才是重中之重。现在本土只有“新中式”产业的集聚,却没有高品质的品牌,只有文化形象而缺乏文化内涵,从而在世界上难以争得高端品牌的一席之地,这是需要加以改变的现状。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在“新的消费增长点”之中,单独点出“国货‘潮品’”这一关键词。笔者认为:新国潮应该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成为共同富裕的文化推手,成为人文经济的主

力军。

一件衣服卖500还是5万,通过什么增加单位产品的附加值呢?不仅仅是高大上的科技提升,还要增加文化含量、品质含量,后者对于“新中式”而言更为关键。我们考虑“新中式”,更多是从消费的角度做出的,其实“新中式”的普及也可以带来普遍生产,实现民众的共同富裕。

如何面对“新中式”

面对“新中式”,应该摆明三个原则:文化上要鼓励,产业上要规范,政策上要跟进。

关于文化宏观政策上的建设,对于“新中式”的文化应进行长期的规划,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可行的。有三个具体的实施措施可以去做:首先,建设“新中式”的示范企业、单位和园区,为高质量的“新中式”提供范本。当今“新中式”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产业集聚已形成了,但中国化的著名品牌,特别高品质的品牌很少,能“出海”的更少之又少。其次,亟待要做分行业“新中式”标准的制定。“新中式”的各个领域尽管与文化产业有所重合,但是文化产业的传统分类覆盖面显然是不够的,“新中式”要重新进行产业划分与标准设定。那么,如何做好标准的制定,建议可以采取在国外成熟运作的“一臂间隔”模式来实施,也就是让各个专业的行业协会在文旅部门和“新中式”企业之间形成中介。最后,还要促成“新中式”文化品牌的形成,从而使得本土化的文化标杆得以树立。必须承认,“新中式”的发展还不成熟,但是通过将生活美学产业升级为2.0版本,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内涵发展,“新中式”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思政课如何让年轻人“路转粉”

□ 陈培浩 张 俊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讲道理”对于上好思政课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为更好开展思政课教学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本质上是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影响人、感召人,进而启迪认知、引领指导、规范矫正、塑造心灵。把道理讲深,才能以理动人。当今时代,青年人最不缺的就是信息获取途径,依葫芦画瓢、照本宣科式的讲述很难让学生打起精神,更遑论“互动值”“抬头率”。反之,那些搬砖入里的思想理论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无形之中就会让学生“路转粉”。把道理讲透,才能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青年学子正处于求知欲最旺盛的人生阶段,渴望听到视角独

到、全面把握的“是什么”和条分缕析、旁征博引的“为什么”。教师的分析切中肯綮、一语中的,学生就能体会到恍然大悟、醍醐灌顶的豁然感。倘若教师的讲述一如半解、含糊不清,学生也只会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措。把道理讲活,才能以理启人。讲道理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领悟道理启发实践。这一个“活”字,不仅是指教学语言和教学方式“生动灵活”,更是强调要把道理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让人能“活学活用”。当道理从书本上的白纸黑字演变为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钥匙”,学生“用得着”“用得顺手”,自然会更愿意听、更愿意学。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表面上看是教学方式方法的问题,实际上考验的是教师的知识素养与综合能力。首先,纵向精深和横向博通方能谓之“深”。这个“深”字,并非是指道理高深、深奥,而是指内容深厚、视野深远、思考深刻。要把道理讲深,不是多开几张书单、多找几本经典著作、多寻章摘录几句马恩金句,再堆上一叠厚厚的大部头就万事大吉,而是需要教师切实把理论功底练扎实,把分析表述能力练通透,同时还要及时关注思考国内外大事要事,开拓心中所藏和目之所及。其次,洞彻事理、融

会贯通方可称为“透”。教师要让学生从“知其然”做到“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前提是自己先“吃透”,要对道理的发生机理、内在逻辑和因果规律等深层次问题了如指掌,特别是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要义正确观察和分析阐释问题。相反,讲课穿靴戴帽、堆砌材料,一堆大话套话,本质上是思想理论还没吃透,辨不出实质、抓不住核心,自然达不到预期效果。最后,学以致用、触类旁通方可称为“活”。思政课要讲的奥义、道理,根本上源自广阔的社会实践。教师要把抽象的理论讲具体、讲鲜活,还得“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少不了能沉得下心、俯得下身、迈得开腿,亲身走进大街小巷、田间地头,了解民间生活百态、触及社会关切问题,才能在思想上“接地气”“沾露珠”“冒热气”。

当然,上好思政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既要长时间打磨修炼“内功”,也要与时俱进创新思维、用好方法。紧和说理对象“一个主体”。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认知和心理发展程度不同,各自想法和诉求也会有差异。有的教师自觉准备很充分、方式很丰富,但学生在

台下无动于衷,说到底还是因为所讲内容与学生的关注圈没有发生交集。教师要善于“因人制宜”,循序渐进、螺旋上升设计课程目标,紧扣学生的关切问题,把思政课与学生成长发展、求职就业等联系起来,使之从被动学到主动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贯通校园内外“两处课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真理不仅写在书本里,也蕴藏在大地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思政教师要利用好学生社会实践的契机,善于把研学交流、下乡支教、志愿服务等活动中“思政元素”挖掘出来,真正把教材里的学问、课堂上的道理转化为学生观察世界的眼力、行万里路脚力,以及成长成才的活力。用好历史、当下、未来“三项素材”。抽象的道理只有与火热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思政课才算有了生命和温度,听的人才能动情用心。要把“大道理”和“小故事”结合起来,以历史的精彩回眸吸引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鼓舞人,以心之所向的未来和远方激励人,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打动人心、洗涤心灵,凝聚力量、助力前行。

当人类刚刚跨越2000年的世纪交替时节,已经沉睡了上万年的浦江上山遗址被考古发现。据专家们考证,上山遗址距今有11400年至8600年历史,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等权威人士认为,上山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严文明更是以“远古中华第一村”来命名上山遗址。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将浙江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史从跨湖桥、河姆渡、良渚的史前文化史足足提前了两三千年。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构成了浙江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和文明特质。2006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专门作出批示:“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研究和宣传“上山文化”,探究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有助于向世界呈现中华文明更加丰富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

万年上山

走入上山遗址,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人”字形屋顶,外形保持原始村落建筑结构的上山遗址博物馆,黄土砌成的大门上书“上山考古遗址公园”。这是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南村一座名叫“上山”小山丘上的原始村落,周边的浦阳江上游河谷地带地势平缓,很难想象距今已有万年的“上山”文明竟在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山丘里发源。当时的“上山”人走出洞穴,来到这里驯化和种植水稻,过上定居生活,孕育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上山遗址首次被发现至今24年里,分布于钱塘江及支流两岸的台地上,先后发现了包括浦江上山遗址、义乌桥头遗址、永康湖西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仙居下汤遗址等24处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被统称为“上山文化”。

置身上山遗址北区,惊讶于约50—100厘米厚的相对完整的遗址地层,从下层、中层、上层3个阶段依次堆积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存近5000年的文化底蕴。万年上山,主要是指其下层的上山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独特,从展厅陈列的文物及其说明可以清晰地看到“万年上山”之“万年坐标”的价值所在:一是遗址出土了距今万年之前的稻米遗存,以及夹炭陶片表面发现的较多稻壳印痕和胎体保留有粒形明确的稻谷壳粒,经实验证明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二是以大口盆、平底盘、双耳罐为典型代表的陶器群和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石器组合,迥异于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具有明显的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特征,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中更为原始的一种新发现。三是发现了结构比较完整的木构建筑基址和东亚地区最早的人壕,不同于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的其他万年以上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反映了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定居生活更具优势的发展地位。

上山遗址及其周边遗址群的发现,突破了学界关于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早期考古学文化年代和面貌止于河姆渡文化的认识。万年的时间尺度,证明了远古年代就住在钱塘江流域的人类先祖,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稻的食物属性并开始人工管理栽培水稻的那群人。以上山遗址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文明,开启了最早的聚落定居农耕的时代,主导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农业革命——“新石器革命”,人类文明从此迈出了极其关键性的一步,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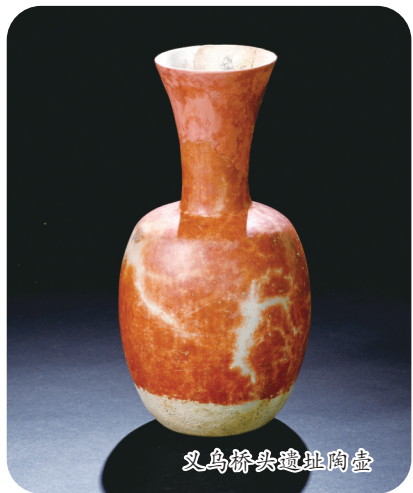
世界稻源

一粒米,一万年。2021年国家博物馆曾展出一粒表面呈现出斑驳的焦黄色的炭化稻米,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粒驯化稻米——上山人工栽培稻米。“上山文化”的发现,无疑打破了先前的所有纪录,重新找到了上山稻作为农业起源万年新坐标。专家们把上山遗址发现的稻作形象地称之为“上山稻”,并从中发现了原始稻作驯化与栽培过程中种植、收割、加工磨碾、食用等较为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产生了“上山稻”作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的历史纪录。2020年已90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专门为上山遗址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

一陶器,一世界。一个夹炭陶片里发现了稻米遗存,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走进上山文化遗址——探究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农业革命」

□ 陈旭东



义乌桥头遗址陶壶

我们的先民不知因为随意还是有意的行为,将碾碎的稻壳及稻叶掺和在陶土中制作成粗犷豪放的陶器,让一万年后的人们不仅看到世界稻作最早的栽培行为,也感受到亘古天地人间最早的“烟火味”。作为“上山人”生存实用品的陶器,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考古学家通过桥头遗址彩陶的质地、造型和纹饰发现,“上山文化”的彩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具备了相当成熟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2020年11月召开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向世界宣布考古学界达成的一个共识:“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将中国——“上山文化”列为当代中国一线考古人八大核心考古遗址,并作为世界稻作起源的万年样本。2021年10月,“上山文化”遗址与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及官窑遗址一起被评为中国考古学“百年百大”发现。

从已见诸报道的考古统计来看,钱塘江附近区域占了中国9000年前遗址总数大约40%。中国作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上山文化”最早形成的稻作遗址密集分布在钱塘江上游支流,可见“上山文化”遗址群是农业起源“中国中心”的典型代表。如果用今天的大历史、全球化视野看待这个问题,从“上山文化”稻作起源这一原点出发的稻作农业发展,影响了当今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存。推动“上山文化”申遗,溯源中华文明光辉起点,对填补世界遗产中稻作起源的类型空白、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